

# 第一章 变革社会、启蒙国民

## ——20 世纪初传播西方哲学的主题

1898 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维新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1911 年，又爆发了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伴随着这两次社会变革，西方哲学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传播力度虽然不大，但是，却迎合了社会变革的需要，特别是起到了启蒙国民的作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曾经回忆过梁启超在这一时期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对他产生的影响，他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有更高的民族，很高的文化。”<sup>①</sup>可见，在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社会制度变革，而且通过思想启蒙，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 第一节 西方哲学初入中国

1898 年维新变法失败后，许多维新志士流亡海外，他们中很多人转向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引进。不仅改良派意识到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性，逐步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主角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非常重视西方文化的传播。但是，从总体上说，西方文化以及哲学的传播还是服务于政治变革的需要，也就是说，政治变革仍然是社会变革的主题，思想变革还是次要的问题。这种情况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

<sup>①</sup> 胡适：《四十自述》，第 170 页。

期才得以改变，思想文化变革才成为社会变革的主题。历史也最终证明，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思想而得到传播并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历史面貌。

### 一、清末中西文化交流中触及西方哲学

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之间除了物质层面的交锋之外，在文化方面也展开了交流，这为 20 世纪初大规模传播西学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留学西方，学习并且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另一方面，西方的知识分子来到中国，主动地送来了西方文化。

在清朝末年，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是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是容闳等人，容闳从美国回国后，就一直大力提倡并鼓励向海外派遣留学生，鼓励向西方亲身实地的去学习，从而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1877 年 3 月 31 日，出于洋务运动的需要，在洋务派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近代第一批有组织派遣的留学生开赴西欧各国。此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二、三、四批留学生分别被派出。这些留学生主要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科技文明被派去的，而且其中大部分的留学生后来都成为我国科技、工业领域中的开拓者。不容忽视的是，很多人在带回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同时，也接受并且带回了西方的政治法律和哲学的新思想观念。例如严复本来是被派去英国学习造船的但是他却翻译了《天演论》，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戊戌变法之后，留学活动继续开展，主要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以学习军事和实业为主，以公费为主。除了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之外，日本也是留学的主要国家，1896 年，中国派出首批赴日留学生，1902 年，赴日的留学生达到 500 多人，其中民间自费的非常多，到了 1906 年居然达到 8000 多人。除此之外由庚子赔款兴起的留美教育也是 20 世纪初留学活动的主流。所有这些留学活动，大大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学到了先进的西方物质文明，而且带回了西方的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西方的生活方式等。他们懂得西方国家的语言，对西方哲学在

中国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许多人在 20 世纪初 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成为传播西方哲学思想的主力军。

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国门被打开的一个必然结果。国门被打开后，一方面，中国人通过留学西方带回了先进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人进入中国，主动地介绍西方文化，从而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清朝末年，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些西方哲学的传播工作。留学西方的中国人——王韬就写过《英人培根》 颜永京翻译过斯宾塞的《肄业要览》和海文的《心灵学》 此外 中国人在这一时期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是非常少的。相反，对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来中国的西方人做的工作就更多一些，并且涉及的内容也更宽泛一些。这些西方人主要是一些传教士，他们不仅介绍西方现代的哲学思想，还介绍一些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哲学思想。在这些著作中有：

慕维廉的《培根格致新法》被连载于 1877 年的《格致汇编》上，里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培根的著作《新工具》第一卷的内容。

韦廉臣的《希利尼原流备考》被连载于 1877 年诸期的《万国公报》上，其中简略地介绍了从泰利士到斯多葛学派的古希腊哲学思想。

1885 年在艾约瑟著的《西学略述》第五卷“理学”(也就是哲学)中 简略地介绍了希腊哲学 包括伊奥尼亚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斯多葛学派的思想 此外 还介绍了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包括托马斯·阿奎那、邓·司各脱的思想 还有西方近代的哲学 有笛卡尔、马尔布朗士、洛克、巴克莱、休谟、莱布尼茨、康德、苏格兰学派的思想 同时也介绍了当代的孔德和斯宾塞的哲学。

1885 年 艾约瑟翻译了耶芳斯的《辩学启蒙》 原书系耶芳斯为《科学入门丛书》写的一本小册子《逻辑》 后来严复于 1909 年也翻译了这本书 名字叫做《名学浅说》。

另外 还有傅兰雅著的《理学须知》。这本书是对穆勒《逻辑体系》

一书的简要叙述 虽然出版于 1898 年 但是比较起严复 1905 年翻译出版的《穆勒名学》也就是穆勒《逻辑体系》前半部分 要早上七八年 而且傅兰雅介绍了《逻辑体系》全书的内容。

实际上,西方哲学的广泛传播是 20 世纪的事情 但是 不能忽视 19 世纪末期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一定的意义上, 19 世纪末期的中西文化互动是 20 世纪西方哲学大规模东渐的基础。

## 二、日本是西方哲学初入中国的重要桥梁

在西方哲学向中国早期输入的过程中,从西方先进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引进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此外,日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前眼中的弱国变成了强国,一时间,人们意识到日本不仅在政治制度革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更为根本的是日本在输入西学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因此,仿效和学习日本吸收西学的经验,就成为当时爱国人士的文化共识。当时,不仅大量的青年学生东渡留学,而且不少维新派和革命派为了逃避国内封建势力的迫害也前往日本,从而得以研究和学习日本成功借鉴西学的经验。同时,从政治上讲,当时的日本政府对待中国人较为宽容,特别是对民间友好人士更是热情的欢迎,所有这些都吸引中国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云集日本。这样,日本就成为中国留学生和进步人士最为集中的地方。在这里,许多中国人主动地接触和学习西方哲学,从而使日本成为西方哲学在近代输入中国的重要桥梁。

从历史上看,日本也是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也是被动地解除了长期延续的锁国政策的,然而,明治维新时,日本人除了主动地学习西方科技与政治文明外,还主动地吸收西方哲学。当时,日本天皇向国民宣示了五条御誓文,其中就讲到要“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正是这种向西方全面学习的开放态度与做法使日本逐渐强大起来。与近邻中国相比,这一基本的文化开放格局决定了日本在输入西方哲学方面领先了一步。

在日本 早在 1862 年的时候 被称为‘日本西洋哲学之父’的西周就提出了讲习希腊和欧洲哲学的草案。1877 年 东京大学首先在大学中正式讲授西方哲学，并且直接聘请外籍哲学教授讲授西方哲学。1884 年 加藤弘之、西周等人积极组织‘哲学界’为日本后来哲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知识精英。同时，日本对西方哲学的翻译传播也在一直进行 如卢梭的《民约论》最早于 1878 年即有服部德的译本，1882 年又有中江兆民的《民约译解》出版。1873 年 密尔的《伦理学》已经在东京被作为学校教材来使用。1877 年《自由之理》的日译本出版。1878 年 斯宾塞的《代议政体论》被翻译成日文。1880 年 斯宾塞的《教育学》被译成日文。1876 年 何礼之翻译了边沁的《财论纲》。另外 边沁的《科学正宗》、《自由论》均于 1883 年翻译成日文出版问世。同时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德国哲学占据了日本的哲学界，先是黑格尔哲学流行，继而康德、尼采哲学也流行起来。到了 19、20 世纪之交，哲学界的前卫已经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

而在中国 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一般知识分子仍然抱守‘中体西用’的信条 排斥西方文化。虽然 1863 年在北京就已经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也相继设立了同类的译书机构，但是所翻译的著作影响非常有限，而且内容上多局限于西方的历史、地理、科技等自然科学著作。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哲学的传播非常有限，当时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两本书：一是《天演论》，一是《民约论》前者于 1895 年才开始翻译，后者于 1901 年才开始翻译。

到 20 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而日本在中国的这一变化过程中则是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901 年，中国留日学生开始翻译哲学社会科学类的书籍，留日的杨廷栋等励志会会员还创办了杂志《译书汇编》，仿照日本杂志的体例，刊载大量留学生的翻译著作，这是最先出现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刊物。之后 流亡日本的各党派人士办的杂志 如《民报》、《船报》也相继问世，为哲学的翻译与介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园地。留学生，包括流亡与旅居日本的许多著名思想家 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

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鲁迅、郭沫若也开始了解和传播西方哲学。

在当时居住日本的思想家中，梁启超对西方哲学传播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认为梁启超在 20 世纪初的主要贡献就是在日本发表了许多西方哲学思想的文章，可称为一代启蒙大师。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面对日本的数千种西学著作，他从中汲取了巨大的思想活力，并且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哲学的论文，内容极为广泛，从培根、洛克到康德、斯宾诺莎等都有所涉及。但是，梁启超对西方哲学的介绍是相当浅近的，他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解也是不确切的。王国维没有去日本，但是，最初王国维也是借助西方哲学的日译本而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的。早年，王国维进入上海的东方学社学习日语，花了两年时间学会了日文。此后，他就通过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的《西方哲学史》日译本来研究康德的哲学。通过日本接触西方哲学的还有中国近代哲学家章太炎。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章太炎旅居日本，接触和研究了大量西方哲学书籍。特别是 1906 年，章太炎出狱后第三次到日本，他精心研究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学说，以及康德、叔本华、尼采德国哲学家的学说，这对章太炎日后的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 20 世纪初，通过日本，中国人不仅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而且，在后来中国人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中，许多哲学的译名也是来自于日本。许多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日本翻译西方哲学的影响，借取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名称。例如，“哲学”这个基本的概念，也就是西文“philosophy”，就采用了日本哲学家西周所确立的日文译名。在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上，中国学者沿用的日文译名还有感性、悟性、归纳、演绎等一大批词汇。

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与地缘条件下，日本在西方哲学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这一角色确实帮助中国人更快地接纳了西方哲学。由于是间接地接纳西方哲学，因此，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也就多了一层隔膜。后来，许多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都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们通过直接学习、创造性地翻译等途径来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从而开始了直接接纳西方哲学的历史，日本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桥梁作用。

### 三、20 世纪初全面启动对西方哲学的输入

19 世纪末 西方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 但是 这时只是零星地输入。全面意义上启动西方哲学的输入，则是发生在 20 世纪最初的几年。这种态势，可以从当时翻译出版的西方哲学的书籍和中国学者发表的西方哲学文章的情况得到证实。在翻译西学著作方面，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提供了两个翻译西学著作情况的书目表，一个是 1899 年的《东西学书录》，一个是 1904 年的《译书经眼录》。<sup>①</sup>从这两个书目表上，我们可以比较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著作翻译和出版的情况。可以看到，19 世纪末 西方哲学著作开始翻译出版 到了 20 世纪初的几年，翻译出版的西方哲学著作有了显著的增加。

在 1899 年的《东西学书录》中 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书籍数量共有 228 部，占翻译著作总数的 41% 而工艺和兵制两类著作也占了总数的 19.3% 这说明在 19 世纪末输入的西学著作中，兵制、工艺等实用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著作是西学输入中国的主流。但是，在《东西学书录》的学科分类中，却第一次出现了哲学类，当时叫理学，其中收录了 12 部书。从内容上看，大部分是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方面的书籍 如《辨伪启蒙》、《理学须知》、《格致新知》等 其余的都与哲学没有关系 在其他的分类中 却收入了《天演论》等书。由此可见，19 世纪末，在西方哲学传播的开端，不仅西方哲学著作的数量很少，而且著作目录的分类也模糊不清，这是西方哲学开始输入中国的一个必然景象。

在 20 世纪初的几年，西方哲学著作的传播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 1904 年的《译书经眼录》中 兵制、工艺等实用科学的著作下降 仅占 6.3%；自然科学各门类著作的翻译数量也开始下降，占

黄见德等：《西方哲学东渐史》，武汉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52~53 页。

23% 而哲学、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类书籍的翻译数量大幅度上升，成为西学输入中国的主流。其中，政治方面收录了 70 部，占总数的 13.1%，哲学类译书的增加则是十分明显的，共收录了 34 部，占总数的 6.4%，哲学社会科学各类译书加在一起，占到总数的 61.5%。

从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西方哲学的文章看，20 世纪初也是大量传播西方哲学思想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开始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一书，其中辑录了从 1857 年到 1918 年 60 年间的近代期刊，共计 495 种，一万一千余册的全部篇目。在这些篇目中，从 1895 年到 1900 年发表的文章中专题介绍西方哲学的论文，只有 1899 年刊登在《新亚时报》第十册上的《培根论》一篇，数量极少。绝大多数有关西方哲学的文章，都是发表在 20 世纪的最初几年，其中 80% 的文章又都集中于 1903 年、1904 年和 1905 年这三年中。

20 世纪的最初几年，西方哲学的输入全面开始。西方哲学的输入数量剧增，但是，对西方哲学的输入却缺少选择性以及针对性，同时传播的质量也不高，缺乏学术深度。

从输入西方哲学的内容看，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如古代希腊罗马哲学，还有当时诞生不久的现代西方哲学，都被介绍到中国。从《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中所列的中国学者发表论文的目录中可以看到，其中有：西方哲学通论，19 篇。古代西方哲学，21 篇。近代西方哲学，64 篇。现代西方哲学，43 篇。四类共计 147 篇。<sup>①</sup> 这些文章涉及的内容有进化论思想，还有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思想，同时也有形而上学和科学认识论等思想。可见，这一时期对西方哲学的传播是非常繁杂的。

另外，在这一时期对西方哲学的传播中，翻译和介绍性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而深刻论述与评价的研究论著却是十分的稀少。而且，即使是这些介绍性的文章，大多数也是根据国外的哲学书籍转述的。所以，从整体上看，虽然对西方哲学的传播涉及的范围很广，却也明

黄见德等：《西方哲学东渐史》武汉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63 页。

显呈现出肤浅介绍的特点，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西方哲学的消化与吸收了。

## 第二节 变革社会的理论武器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西方哲学的传播紧紧地服务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就传播主体来看，宣传西方哲学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主观上，传播西方哲学就是为他们的社会变革活动提供新鲜有力的理论基础；客观上，他们宣传西方哲学确实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仅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角，而且是西方哲学的热情传播者，他们都把传播与接受西方哲学看做是他们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就传播的内容来看，进化论与社会政治思想就是变革社会的理论武器。这说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实用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 一、严复译介西方进化论哲学

传播西方进化论思想迎合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它直接地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政治斗争。

进化论是 19 世纪西方生物学界的一种关于生物界物种发生与发展的革命理论，也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以实地考察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论证了世界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生物到人的自然演进过程。把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一样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发展规律。这种社会进化论的思想最切实地满足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改革传统社会、谋求民族自强的意愿。

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大都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康有为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前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他认为从自然

界到人类社会都遵循着进化的规则 并且 他还运用《周易》中的辩证发展的思想去佐证进化思想。他为了迎合变法维新的社会需要，把进化论思想与传统的循环进化的思想结合起来，托古改制，建立了他的大同说。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大多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不仅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 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也抱有进化论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人兽同争的太古洪荒时代，再到神权时代、君权时代以及民权时代的社会进化的历史进程的思想。章太炎也提出了颇有特点的善、恶俱分进化论的思想。

在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传播中，对当时知识界乃至社会生活影响最为深刻的 应当说是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前的所有翻译作品中，严复的《天演论》对社会的影响是最大的。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 不仅仅是翻译 而且他通过翻译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服务于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在把进化论思想输入到中国的时候，严复没有翻译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著作，同时也没有翻译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著作 而是有选择地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即使是翻译赫胥黎的著作，他也并不完全赞同其思想。一方面，严复不同意赫胥黎分割自然进化与社会进化的思想。赫胥黎认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是对自然界进化的一种抑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可以称之为伦理的过程。严复认为，与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首要的也是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另一方面，严复也不同意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类社会虽然本质上与自然界相同，但是，严复认为人类可以合作，可以“群”并且以“群”来克服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达到进化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又在自己的理解上赞同赫胥黎的说法。这就是严复对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创造性解释。

严复传播进化论离不开他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从 1894 年开始 他就抱着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开始了《天演论》的翻译。他的目的

是向中国人敲响警钟，说明不主动变法、不向先进的国家学习，自己的国家、民族就会灭亡的道理。他的翻译，是从当时自己对中国的社会实际的理解出发，有选择、有评论地进行翻译，同时把这些道理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严复从事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他对《天演论》的翻译是赫胥黎原著的一种再创作。在国家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面前，一方面：严复肯定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目的是以此向国人发出警告，中国必须赶快自强，否则就要被自然所淘汰就会变成列强的奴隶。所以中国应当顺应“天演”的自然进化规律来进行维新变法；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能“群”并且社会是通过“群”来进化的所以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进行变法革新，从而走向富强、民主的国家之路。

除了通过翻译《天演论》来宣传进化论思想之外，严复还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与《救亡决论》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宣传他的进化论思想以此激励国人变法图强。在传播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作品中除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外还有梁启超的《天演论初祖达尔文学说及传略》、吴新中节译的《天演论》以及其他翻译的《泰西达尔文及学说》以及《物竞论》等。除了一些翻译作品之外还有大量的介绍进化论的文章面世，特别是梁启超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变法通议》、《说动》、《论进步》、《进化论革命者领德之学说》等。

在近代传播的西方思想中，进化论的影响是最大的。进化论思想为当时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与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与革命找到了发生与发展的动力与目标；同时，进化论的传播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唤醒了社会民众，使许多人投身于求国家自强、社会改革与革命的大潮中去。

针对严复对进化论思想著作的翻译，贺麟这样评述：“现在纯从哲学的立场觉得对他（严复）的译述工作另有不同的看法。第一他没有译述比较专门的哲学著作。第二他介绍进化论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等观念以警惕国人，他介绍英国的功利主义，以策勉国人努力

富强之术，对前说忽略其生物学研究，及其发生的方法，对后者忽略其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和注重社会福利、改善平民实际生活的社会改革思想。当然，他有他的苦衷，他为他的时代和读者群所限，然而足见他详述的目的是实用的，有救治当时偏弊的特殊作用的。换言之，不是纯学术的。他所译述的学说不是他服膺有心得的真理，而只是救时的药剂。所以到晚年来他会自己放弃，甚至反对他所详述过的学说了。<sup>①</sup>从贺麟对严复的评述中，可以看到，一方面，肯定了严复出于社会需要翻译进化论著作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严复翻译工作强烈的实用性带来的消极意义，那就是对西方思想缺乏严肃的学术研究，从而不能真正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

## 二、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输入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制度革新的现实需要，除了西方进化论思想之外，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也被直接介绍到中国。

中国近代制度革新的内容是仿效西方建立民主与自由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思想的选择上，为了迎合社会的需要，英国的政治民主与自由思想以及法国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都被介绍到中国来。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之后从 1901 到 1909 年的十年间又相继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也就是《自由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也就是《论法的精神》）等西方政治思想著作。这些西方政治思想著作的翻译给中国的思想界吹进了一股强烈的新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出版了日本学者中江笃介汉译的《民约译解》第一卷，也就是法国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900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杨廷栋翻译出《社会契约论》在《译学汇编》1900年12月到1901年12月的一、二、四、九期上连载发表。

除了大量翻译西方社会政治理论著作之外，许多中国学者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介绍这些思想，如严复、梁启超、马君武、邹容等人。

贺麟：《五十年来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6 页。

严复在早期《辟韩》一文中就接受卢梭天赋自由的思想 他提出“民之自由 天之所畀也。”而后 又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来宣传英国思想家穆勒的自由思想。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 先后编印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用编译的方式大力宣传西方社会政治以及哲学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方面 他发表了《卢梭学案》、《法理学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和《功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文章。在《卢梭学案》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就论述了卢梭提出的天赋人权 即自由与平等的学说 并且借用卢梭说的“凡弃己之自由权者 即弃其所以为人之最也”的话，强调了自由与民主对于中国人的极端重要性。

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传播，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人士大多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中找到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一度受西方激进的政治思想影响而接近革命派。黄兴于 1899 年在日本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后就萌发了革命的思想。1902 年 邹容在日本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写下了被誉为中国第一个“人权宣言”的《革命军》一书 书中讲到要“杀尽专制我之君主 以复我天赋之人权”<sup>①</sup>。正是在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下，许多中国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中去。

20 世纪初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介绍是为了迎合社会变革、民族救亡的社会需要而进行的。这时的知识分子对康有为等宣扬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感到不满，他们力图直接了解西方的政治思想，以此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后，一部分维新派以及革命派已经意识到制度的变革绝对不能寄托在旧的封建传统文化上。梁启超就表达了对其师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反对。革命派更是直接地宣传有益于革命和建立共和政体的西方政治思想。

实事求是地说，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维新派与革命派对西方社

<sup>①</sup> 邹容：《革命军》 民智书局 1928 年版，第 32 页

会政治思想的介绍虽然起到了巨大的促进社会进步与国民启蒙的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刻地理解西方的政治思想。比如严复就混淆了西方政治思想与中国思想的区别，他说，自由即是中国的自繇，自由就是没有限制，道家与佛家宣扬的逍遥与超脱也成了自由。这一点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才明确指出，西方的自由是个人主义的自由，而中国则是以家族为本位的自由。同样，梁启超对西方政治思想也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在介绍西方思想时，常常采用传统的陆王心学以及佛学的观点来加以解释。比如，他把自由理解为“除心中之奴性”，西方政治自由成为传统心学强调的道德实践上的主观能动性。

虽然他们没有从学理上讲清近代西方的政治思想，但是，他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介绍所起的社会改革与思想启蒙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正是这些先行者的努力，西方的政治思想才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并被先进的人们所接受，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坚冰才被慢慢打破。

### 第三节 科学与人本精神的早期启蒙

20世纪初对西方哲学的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进程，而且具有伟大的启蒙效应。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胡适、鲁迅都毫不讳言从世纪初西方哲学的传播中得到的思想启蒙。胡适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诸篇给他开辟了一个思想的新天地。鲁迅则是把宣传进化论的革命者章太炎看做是自己的精神导师。胡绳谈到梁启超在这个时期传播西方哲学的作用时说：“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是做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工作，帮助许多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人们（特别是青年）打开了眼界，并且从封建文化的对比中，更看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sup>①</sup>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人们不仅接触到西方进化论、社会政治思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页。

想，而且，在西方文化的传播中还初步接受了西方科学精神和人本精神的洗礼。这种启蒙主要体现在对西方近代科学认识论与现代意志主义的介绍上。

### 一、严复介绍西方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

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保持中国传统的道德、政治制度和文化 就可以富国自强 即‘中体西用’说。严复从“体用不分”的立场出发，主张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离不开对西方科学精神的学习，具体说，就是离不开对西方科学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学习。

严复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必要性。他说，西方文明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个是科学精神，即“ 缜伪崇真 ”的精神；一个是民主精神 即‘ 屈私为公 ’的精神。因此 严复在翻译介绍西方进化论以及社会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努力介绍西方的科学精神。为此 严复翻译了穆勒的《穆勒名学》（也就是《逻辑学》）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著作。

严复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之所以船坚炮利、国富民强，不只是西方有比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制度，在这些背后还有着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科学认识论与逻辑学，严复把这归结为培根开端的近代经验论与归纳法。在《原强》中 严复说：“是以制器之备 可求其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孔德；用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 民生之寿 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 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 严复把培根的经验论与归纳法称为“ 实测内籀之学 ”。实测即经验论思想 主张科学认识应当从现实事物的实际经验出发 而‘ 内籀 ’也就是科学认识采用的方法 相对于“ 外籀 ”（演绎方法）而言；“ 观化查变 见其会通 立为公例 ” 这就是“ 内籀 ”的归纳法。由此 严复批评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 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 不实验于事物 而师心自用 ” 盲目相信古人 同时 他认为古人的思想“ 大抵心成之说 ” 这当然也不能归为西方的‘ 外籀 ’的演绎方法。

严复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的认知方法本质上是与西方科学方法

对立的。陆王心学可以说是‘心成之说’的登峰造极。严复在《救亡决论》中说：“夫陆王心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面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齟齬否？又不察也。向壁虚造，顺非而泽，持之似有故，言之若有理。……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惟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

比较起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学者来讲，严复不是限于对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的简单认识，而是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来理解西方的科技文明，并以此批判传统文明。严复对西方的科学认识论和逻辑方法的介绍，以及严复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传统文化作出的深刻反省，这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思想启蒙意义。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科学主义传统中，严复当仁不让是奠基者、开拓者。

除了严复之外，20 世纪初的梁启超对西方的科学认识论思想的传播也做了一些工作。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近代西方各派哲学的观点，特别是科学认识论理论。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介绍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两位奠基人培根和笛卡尔及其学说大旨。他认为，西方近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古代，根本区别在于“学术之革新”。这里所谓“学术”实际上是指一套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思想。他指出，近代西方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些思想上的。他把提出这些思想的培根和笛卡尔称做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始祖，并且他具体地介绍了培根提出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提出的理性演绎法，阐明了它们对于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以及对近代西方社会产生的推动作用。他指出，尽管他们一个强调经验，一个重视理性，但是，他们在思想自由这一点上对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相同的。梁启超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像培根和笛卡尔那样在思想上既不做中国旧学的奴隶，也不做西方新学的奴隶，要

做到‘我有耳目 我物我格 我有心思 我理我穷’<sup>①</sup>。梁启超对培根以及笛卡尔认识论思想的介绍，实际上已经触及了西方的科学精神，即理性精神、批判精神。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蔡元培，在早期也进行了对西方科学精神的介绍。1906年，蔡元培通过日文翻译了日本哲学家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总论》。这本书是井上圆了用西方哲学观点撰写的一部提倡科学、破除迷信的启蒙哲学读物。全书分为八大卷，即总论、理学部门、医学部门、纯正哲学部门、心理学部门、宗教学部门、教育学部门、杂部门八类，目的是使读者不但知道妖怪的道理而且由此得以了解各门科学以及科学精神。蔡元培的中译本出版后，曾重印五次，可见，这部著作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影响不小，特别是对于宣扬科学精神 破除迷信 移风易俗 其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代表西方科学精神的科学认识论、方法论在中国的广为传播，为后来的西方科学主义哲学的传播以及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二、王国维引入西方意志主义人本哲学

20世纪初，在中国传播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以及科学认识论的同时，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也在中国传播开来。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特别是意志论思想的介绍成为传播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意志论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代，伊壁鸠鲁就已经用原子运动的偏斜说来说明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以此反对宿命论。近代，卢梭的启蒙哲学和康德的批判哲学从不同侧面开启了现代意志论，卢梭认为人的感性要比理智的推断更重要更可靠，认为意志有比理智更优先的作用，凡是真正的意志便是绝对自由的；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为理性划界，他区分现象与自在之物，认为人的科学认识只在现象界管用，而道德才可以进入本体界，所以他坚持实践理性优先

<sup>①</sup>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两大家之学说》，《梁启超哲学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